



問責局長與公務員思維未變

尹靖廷 (15-03-2003)

特首的施政報告與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，最乏善足陳之處是未能為轉變中的香港經濟，指出新的成長點與動力，只寄望於外圍經濟好轉帶動經濟復甦，或抽象地重複「中國好、香港好」的舊調。預算案洋洋萬言，但最能握要地將其背後的思維勾畫出來的，反而是特首在預算案公布之後所作的補充。

特首表示：「長遠而言，政府仍然是想搞好經濟，政府亦會做好兩件事。第一、是解決財赤，第二，改革公營部門的編制，提升政府效率」。在感性上，我們絕不懷疑特首希望為香港做點好事的情操和焦慮，但在理性上，特首的好意恐怕只會得到相反效果，令經濟更快下滑，稅收因加得減。

要突破目前香港經濟困局，除了大幅削減公務員薪酬之外，歸根到柢仍然是發掘新的經濟成長點。配合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動復甦。

特首與財政司亦曾指出，由於香港實行自由經濟，政府的角色有限，可以做的並不多，這是錯誤不過的。香港總商會在年多前舉辦了一個高層考察團到新加坡參觀，新加坡的官員在介紹完政府推動生化科技產業政策之後，香港代表隨即表示，由於香港實施自由經濟，新加坡政府直接參與經濟發展的方法不適用於香港。

但新加坡反駁表示「根據我們理解，香港特區政府不是直接參與和投資於迪士尼樂園和數碼港嗎？問題不在於政府應否直接參與，事實上香港政府亦已作出這一步，兩地不同的只是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投資對象，新加坡選擇了生化科技，而香港則選擇了迪士尼樂園和數碼港而已」。

政府的參與是必要之惡的另一個原因，是考慮到今時今日在香港，無論企業與個人，在整體上尚未脫離經濟泡沫爆破的後遺症，負上龐大債項，投資意欲低落，只有政府才能有此能力帶動這方面的投資。而事實上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到「今次席捲全球的經濟轉型，有一個顯著的特點，是政府所起的獨特作用」。

我們並非簡單地要求政府作更多的公共工程，更是反對政府利用此作為藉口，興建諸如新政府大樓、廉署大樓、新水警總部的公共工程（很難想像政府一方面說削減萬多名員工，但卻以擠迫為理由要增加更多工作空間的矛盾理據），而是一些能夠將「財政開支」轉變為「社會資產」的工程。三十年代凱恩斯主義者提出的公共工程是中性的、以創造就業和消費為主，但我們要求的是以創造新



的優勢為著眼點的開支。

但這馬上涉及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，以香港現時的問題官員素質和公務員體制，是否有能力負上這方面角色的轉變。香港的公務員過往的管理哲學是監管為本（regulatory），講求合規性，而新的管理哲學則是開拓和經營為本（development），兩者是截然不同的取向。

特首要檢討公務員體制，單是從削減財赤的角度和壓縮編制角度出發並不足夠，因為這並沒有涉及到香港究竟需要怎樣的公務員、以協助香港經濟轉型、建立知識經濟的核心問題。事實上，特區政府在以往提出建設數碼港、中藥港、資訊科技港等，從項目的選定到執行，均出現問題，原因亦是由於缺乏「人的取向」因素，希望用舊的體制，去做力有不逮的事。

要創造和推動這些改變，政府的參與是必須的，這是一種必要之惡。亦因此，我個人不同意梁錦松將財赤的責任推給曾蔭權，指過往的減稅措施造成今天財赤局面，因為如果缺乏曾蔭權過往的減稅措施，為負資產者鬆一口氣，香港經濟只會變得更嚴峻。曾蔭權最大的責任反而是未有利用過往數年的喘息空間和公共開支，為香港創造新的優勢，白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資源。

這裏希望為特首再進一言，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與列根的改革，以至中國在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，其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這些國家當年均處於一個通脹環境。但今天的香港處於長期通縮狀態，加上負資產的壓力，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的同時，如果缺乏一些新興行業作為帶動，只會令通縮變得更為嚴峻，到頭來稅收只會因加得減，經濟繼續下滑。以家庭理財的方式處理財赤，缺乏宏觀的思維，後果只會是「好心做壞事」，香港不是沒有前科。

（本文已刊載於 2003 年 3 月 15 日之《信報》。）